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使命

郭超

[摘要]文化自信的提出,给广大史学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文化自信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总结和升华。整体性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人文精神缺失、人文关怀匮乏,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跨越的障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自信;历史虚无主义;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7)04-010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提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置的高度,并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概括了文化自信的地位和作用。^[1]文化自信的提出,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极大的鼓舞。在社会科学所有门类当中,历史学是将历史、自然、哲学、人性学及时间、空间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具体历程和规律的一门学科。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崇高地位。作为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地位、在中国走过近百年的光辉历程、代表中国当代史学主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的当代文化建设中,应承担怎样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做出富有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的探索和回答。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作者:郭超,黄淮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过程,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借鉴先进经验、总结历史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每一次充实完善、创新发展,都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族人民不断前行的足迹,都折射出历史理性的光芒,也都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探究和揭示,对优秀历史成果的吸收和提炼,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类最杰出的贡献,也是将历史学“史鉴”、“史师”作用发挥到极致的理论武器。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日益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力量,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文化自信的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之所以能完整地保留至今,离不开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贡献。作为一门经世之学,中国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官修正史、私人著述代代相传,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人才辈出的史学名家、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丰富多样的史学体裁、卓越不凡的史学思想、经世致用的史学价值,构成了一幅中国传统史学宏伟壮丽的画卷,形成了独特风格和民族气派。无怪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曾为之赞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

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3]p.161}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也曾以此自豪：“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4]p.12}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没有发达的古代史学，就不会有中国灿烂的古文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传统史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就不会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形成到发展、巩固并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取得了史学领域的话语主导权，而且交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方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史学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5]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始终难以处理得当的问题。

近代以来，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的过程中，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在爱国热情的激荡下，把文化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及儒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重新被肯定。近年来，一股国学热在全国兴起。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几千年的传统儒学经典就自然蕴藏着中国文化的未来和希望。针对这一认识，一些史学家提出要“警惕‘国学热’陷阱”，提倡国学“只能陷入传统的束缚之中，而远离人类文明的大道”，“决不是我们进行当代文化建设的有益的选择”。^[6]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既不能“文化自负”，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需要“批判地继承”，这已成为一种共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是耳熟能详的一种表述，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解决。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摒弃？怎样才能做到批判地继承？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没有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批判地继承”就有可能沦为一句空话，或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以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作为本体论基础，以一种真正彻底的、辩证的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才能客观分析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产生、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历史的批判。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的历史，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为当时人们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和手段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才开创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崭新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提供了文化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包含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具体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内的时代精神，成为当前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精神动力。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以总结和升华

让中国人“自信”的“文化”，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化，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造。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提出，无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是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两个概念的提出就可以得到圆满

解决,理论界还面临着具体的研究任务。比如,关于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形成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革命理念和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为耀眼的文化景观之一。围绕中国革命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学界已经在革命文化概念基础上进行了颇多探讨与反思,^[7]但总的说来,关于革命文化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概念逻辑等理论的自身建构尚未完成,有关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精神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同样,红色文化也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什么是革命文化,什么是红色文化,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需借助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进行综合研究。

在多学科研究格局中,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作用,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以总结和升华。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具备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理论指导,能够给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无论是战争年代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的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人民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先进文化,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革命者创造出的精神文化成果。对这些精神文化成果可以研究,可以指出不足,但不能否定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批判地继承,但不能进行市场化的运作,更不能戏说、篡改甚至扭曲。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只有把它们放入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性以及中国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作用。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创新或学术成果,如果不能取得广泛认同,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如此。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经济利益诉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日趋多元多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信息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推

动社会快速发展、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造成剧烈的动荡和阵痛,一些我们不愿看到却难以避免的丑恶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帮助人们明辨是非、认识本质,中国学者应以怎样的视角、胸怀和方法去审视世界大势?又如何与世界人民联手,共同应对人类深陷的种种危机?这是摆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面前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要肩负起庄严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历史规律的探求,来认识社会现实,引导人们朝健康向上的方面前进。因此,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的需求更为迫切,关于人类重大历史问题以及当代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形成共识的任务更加繁重。这就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诉求,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语言和学术风格,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文化教育,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精神食粮。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切身感受到获取历史知识的便捷,体会到历史知识的丰富多彩。小小手机在手,上下几千年,纵横天下事,无不在方寸之间一览无遗;刚刚发生的事件,转瞬就能通过手机传遍地球的每个角落。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个体的每位社会成员的历史知识增加了,但由单个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群体的历史共识不但没有上升的迹象,反而分歧越来越大。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历史知识的普及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广度,然而在对待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个体之间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差别。大至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重大历史事件性质的判断,小到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一事一物的分析评价,有时人们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出现截然对立的局面。比如,毛泽东光辉的一生早已为世人共知,对其一生功过中央也早有结论。但在他去世40多年后,民间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分歧日趋激烈,出现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反毛,一派是崇毛、拥毛。双方不仅展开网络论战,甚至出现骂战和冲突。此外,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敬仰,但近年来屡遭戏谑,就连雷锋、焦裕禄等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模范也频遭非议。这种情况让善良的人们感到困惑和迷茫。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人们历史知识的缺乏;二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打着“学术”的幌子,以重评历史为名,以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为表现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利用网络大行其道。他们利用部分网民对政府、社会的不满心理,将是非辨别能力较弱的网民拉

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编造和夸大‘人祸’，提出‘重写历史’，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三是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是‘戏说’、‘恶搞’历史，以颠覆正史为能事；五是追求所谓的‘价值中立’和‘纯客观’不讲正义性和崇高性。”^[8]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兴风作浪，客观上是因为新兴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如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网络交流当中，都有可能借助各类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是由历史学的缺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严重缺位造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反映的是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立场、看法或态度，但这些大多是历史问题，或是历史问题的延伸，或是由历史问题引发而来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位，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才给了历史虚无主义以可乘之机。

历史虚无主义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于那些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要在政治上予以回击。但是，对于那些缺乏政治鉴别力、渴求历史知识的广大群众而言，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揭开事实的真相。“针对邱少云的质疑谬论，主流媒体以‘军人生理学’等专业概念阐释英雄的顽强意志力；针对网络上否定‘黄继光堵枪眼’英雄事迹的谣言，健在的李继德以‘黄继光堵枪眼时，我在现场’的真相还原，有力地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言论”。^[9]从应对方法上看，“用事实说话”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驳。但不可能事事都能找到亲历者，这种应对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毕竟有限。只有历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有效防范历史虚无主义侵袭最重要的武器。

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门类，历史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发挥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互联网资源的共享性特征，使得历史学家垄断历史学的局面被打破了，他们的学术研究在普通人们心中的神圣性也被部分地消解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除了会面临历史学家群体内部存在的分歧之外，也会面临很多非专业人士的质疑和挑战，形成历史共识的难度客观上大大增加了。在这种形势下，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历史学了？历史学家是不是都应该转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学家的独特价值是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而消失的，所不同的是，其价值的独特性将发生变化，历史

学家已经不再是以向社会提供确定不移的历史知识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10]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历史学有着明显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即观察问题的整体性眼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紧密交织而形成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历史事物、现象都处在与其他各种事物、现象复杂的历史联系之中。如果割断某一现象与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单独加以研究，都不可能达到认识该现象的目的。因此，历史研究的整体性特点，要求历史学家总是把每一种历史现象放入特定的历史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和考察。由于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是一般社会公众难以达到的。

整体性思维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明显特征，这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所无法具备的。有史学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不辨历史的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支流与主流、成功与失误、过程与规律……随意剪裁和拼凑史实，牵强附会，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指鹿为马，糟蹋历史。”^[11]整体性思维也就成为历史学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武器。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整体性思维在具体研究中的指导性意义，由此担当起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历史重任。具体而言，应强调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巩固其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奠定主导地位也有近70年的历史。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史学思潮纷纷崛起，历史研究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强大冲击，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知识有着更多、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社会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有可能产生多种历史认识。面对各种史学思潮的强大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进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主流史学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主流史学必须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做出调整。马克思主义史学因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常常被误认为受政治力量的裹挟及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史学工作者的不是教条的束缚，而是主体性的解放。“主流地位不是靠政治的强势，不是靠思想上的强迫，主要靠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学者们自身来努力，通过科学的成果来让人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12]

二是要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近年来，部分历史研究开始利用大数据，很多学术论文都有大量的统计表格，或表达数量关系的函数曲线。这反映了互联网时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变化，即通过复杂的数量关系来更为精确地反映历史，以证明某种历史结论的正

确性。这是恰当的方法创新,也是也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大数据极大地拓宽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同时也为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对中国近现代史、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研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手法,就是随意剪裁和拼凑史料,以偏概全,甚至张冠李戴、颠倒黑白。对这种做法,列宁曾经给予了严正批判:“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3](p.364)}大数据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运用,能够提供充足的、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将成为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武器。

当然,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由于历史内容的无限丰富性,再便捷的统计方法只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和分析,单单用简单的数量关系代替深入的理性考察,是轻率而肤浅的。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慎用数理统计”。^[14]无论数量关系多么确切或真实,都是事物呈现的表面现象,都需要在整体性思维指导下考察其更深层的原因,否则就无法科学地说明历史真相及其演变规律。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理论创新能力,不断更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提升战胜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前行方向,是否真正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其学术实践是否能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在当前复杂多样的史学思潮中确立其主导和核心地位之根本所在。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正在于能够回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大问题,为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而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人居于核心地位或支配地位。无论是推动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全面进步,还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文化自信最终还要落实于人本身。随着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的因素融入人的全面发展的各个方面,要“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15](p.284)}因此,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自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不仅仅是历史真相的揭示者、历史规律的探求者,还需要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为人的塑造、人的教育和人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指导方针和方法原则。

(一)当下中国社会人文关怀匮乏现象存在的原因

当代科技发展促进了人的能力的极大提升,同时也使人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当下中国,一方面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人们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未能同步提升,一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现象未能清除,甚至出现人的身心不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等问题: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作风阴魂不散;过于强调集体观念和集体利益,却缺少对个人的尊重,缺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念,为所谓“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随意剥夺他人财产乃至生命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道德之上,为了物质利益不择手段,造成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有些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只看重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追求,缺乏奋斗精神和冒险意识,急功近利乃至投机取巧;有些人为一夜暴富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上述种种现象体现了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关怀的匮乏。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的弱化。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界奠定了主流地位,本应在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人文精神方面有所建树,但是,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干扰,史学界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影射史学”,粗暴地践踏了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学术尊严。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彼时史学研究存在无限拔高级别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现象,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遗忘乃至压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人文关怀,而将其阶级斗争的属性加以强化或夸大,甚至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纯粹的阶级斗争学说,将其与人文关怀尖锐地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将人道主义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任何个人统统贴上阶级的标签,个体的个性、自由、欲望和追求均被漠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被摧残的时代,也是人们合法权益被践踏的时代。这不仅使史学发展受到严重摧残,更重要的是阻碍了人的身心的健康发展,妨碍了人的能力全面发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产生消极影响。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人文关怀原本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每一个认真

研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了人文精神。无论是他青年时期写下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还是“巴黎手稿”;无论是他思想成熟时期写下的《资本论》,还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人类学笔记》,无不包含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马克思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其根本宗旨是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人的问题和人文关怀是贯穿马克思全部学说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中,人文关怀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了误解。

三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存在一定的缺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孔、孟的“仁”和荀子的“人之所以为人”,标志着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丰富和成熟,奠定了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理论基石。然而,“传统的中国人学理论,只承认人的社会性,只讲人的社会角色,社会义务,而不承认人作为一个感性个体的内在需求,不承认人的任何感性欲望的正当性。因此,它要革尽人欲,造成无差别的社会个体,并由此泯灭了社会个体的创造能力”。^[6]直到今天,对青少年的教育仍不同程度存在着重技能、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为迎合市场导向和就业需要,强调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人文精神缺失、人文关怀匮乏,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全方位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无从谈起。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人文关怀的途径

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不断深入,人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最终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剖析社会问题、引导社会发展,是历史学应有的担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才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历史研究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强大冲击,其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逐渐形成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足鼎立之势。有学者指出:“精英史学的崛起,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自觉打破理论与方法匮乏、研究模式与范式单一的历史研究局面,致力于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

进与利用,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大众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既是继承传统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现代传媒日趋发达的情况下,民众的阅读、欣赏和文化参与出现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他们不再是历史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了主动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激情、叙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冲动和表达历史思想的可能。”^[16]

然而,精英史学、大众史学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样态,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境界,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本质和人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宗旨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的关系,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争取全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马克思没有穷尽对人学理论的研究,他所做过的具体结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和全面。比如,在如何看待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强调人都是社会的人、阶级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学者在《人学历史与理论》丛书的总序中说:“马克思本人也发表了丰富的人学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人学。”^[17]过去受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影响,在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方面也出现过偏差。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需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天的社会情况更复杂,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更高。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丰富、发展和深化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揭示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内涵和价值,对于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今以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为背景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一步凸显出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注重人文关怀以来,人文关怀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也开始加强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从而推动

了人文关怀研究的深入。党的十八大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在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各项文明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从经济和道义上给予关怀,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精神上尊重人,充分实现人的价值。历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就是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指引人生。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更好地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展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话和交流,调节理性思维与精神信仰、物质追求与审美情趣、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矛盾;让传统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文明相结合,共同建构 21 世纪新人文精神,书写崭新的历史篇章。

文化自信的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时代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1.
- [2]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08-24.
-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三联书店,1956.
-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 [6]李振宏.当代文化建设四题[J].学习与实践,2007,(2).
- [7]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8]梅宁华.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J].求是,2010,(13).
- [9]杨建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与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
- [10]李振宏.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J].史学月刊,2016,(11).
- [11]田居俭.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J].求是,2013,(19).
- [12]林甘泉,邹兆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J].历史教学问题,2006,(3).
- [13]列宁全集(第 2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14]陈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J].史学月刊,2015(1).
-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16]王记录.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2).
- [17]李中华.中国人学思想史:总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澄宇

betwe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 as well a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ese achieved the victory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accomplished enormously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undertak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aking the Russian path" refers to taking the pathwa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CPC takes their own undertaking as the success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hil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t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Zhou Xin-cheng)

In Retrospect to the CPC'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o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Domestic academia witnesses insufficient studie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although the CPC highlights the incident with var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to realize their unique social function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crisis-stricken Chinese nation. Thus, the studies on the CPC's commem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could deepen our knowledg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chief forms, social function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PC's commemoration, from which we also learn valuable lessons in term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Zhang Yuan-xin and Wu Su-xia)

From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to "Equity Pattern": analyse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ince modern China: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characterized its social fabric, national structur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cultural morphemes.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as followed the trend of from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to "equity pattern". "Equity pattern" is a rudimentary mechanism for modern society. And its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call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in China. (Zhu Xin-shan)

On the Pathway Towards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ese Women: The CPC's Great Achievements of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or reform, the CPC persistently stick to the great goal of woman liberalization and led Chinese women to explore a unique pathway towards woman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the localized Marxist woman theories theory has been continually enriched and improving. In the face of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 shall adhere to our primal conviction and keep making progress in the new age. We shall also integrate the liberalization of woman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continue the undertaking of the former along the socialist pathw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Shun-yue)

On Alienated Consumption: Its Generative Logic and Deconstructive Pathway: The popularity of alienated consumption suggests its awareness of the age and social factors involved. Its generative logic begins with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develops with that of demand, and leads to that of consumption. The current society increasingly relies on commodity and purchase for expression, which accounts for the emptiness of life and anxiety of survival. Thus, its deconstructive pathway shall start with eliminating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mid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fundamental economic institution, two deconstructive solutions are worthy of exploring, namely, "the more doesn't stand for the better" and "human's satisfaction stems from production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Ning Yue)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mong the Mass in Belgium: It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e bodies for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n Belgium, such as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studies and the Belgian Labor Party, always uphol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t. They publicize Marxism in various ways, make dramatic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moting entities, the expansion of the mass and ideological behavior, and accordingly facilita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Belgium. It is advisable for us to learn from their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terms of entity training, dissemination measures, and etc. so as to further populariz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 Quan-hai and Ding Wei)

On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lluminative Experience: The CPC has long attached significance to political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 not only served as an inevitable alternative for dealing with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but m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fulfill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atisfied the urging need for cultivating the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Republic.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China, the CPC chiefly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standardization, method expansion. Its development is magnificent, while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could provide significant illumination for the current work. Hence,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age shall keep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k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tradition" and "temporariness", "theoretical infusion" and "social practice", as well as "un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Chen Yun-yun)

The Cultural Miss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greatly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the scholars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numerous historian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s a cornerstone has provided significant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fidence entails that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ritically inherit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it summarizes and elevates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he philosophy of integral thinking is its powerful weapon to overcome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depr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barrier to be conqu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We shall stick to the dominance of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tensify the researches on Marxist theories of human beings, an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ultimate libera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Guo Chao)

(翻译:张剑锋)